

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

柯育芳

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和档案资料,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战术运用,进行了深入的剖析,得出了与以前论述不同的结论: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,是“阵地战与运动战、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”,是正确的,阵地防御和战术反击同样重要;在“侧面截击”即反击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,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选择也有重大失误,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,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,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,这次失误,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,第二次重大失误发生在9月上、中旬,主要表现在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和时机不当的问题。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,一是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、情报不准,甚至故意夸大敌情,导致判断失误;二是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,作战意志不坚决,经常畏缩不前,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,三是各作战部队的作战协同问题。

关键词 黄广会战 反击作战 战术运用

—

1938年7月底至9月底,中日军队在鄂东的黄梅、广济(今武穴市)地区,以保卫武汉的门户——田家镇为核心,进行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激烈的攻防战,史称黄广会战、鄂东会战、黄广战役,或称武汉会战黄广地区作战。它是武汉保卫战(又称武汉会战)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关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,多数论著都表述为以阵地战为主,并认为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失利的主要原因,是中国统帅部在作战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,只注意单纯的、消极的阵地防御。^①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。

对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,比较准确的概括,应该是“阵地战与运动战、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”。^②

之所以说这样的概括比较准确,一是它反映了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实际。在黄广会战中,中国军队有大量的反击作战,对会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一是中国统帅部和负责具体指挥的第五战区及其右翼兵团,就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,作出了大量的部署、指示和安排。在这次会战中,蒋介石和他的许多高级将领,采纳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的建议^③,吸取了前段时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,基本放弃了单纯的、消极的阵地防御的作战方法。

蒋介石对黄广会战中国军队作战的部署是:“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连系,极为重要,应置重点于该地,集结兵力,纵深配备”;

^① 郭汝瑰、黄平章主编: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》下册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,第828页。江涛著:《抗战时期的蒋介石》,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,第82页。刘跃光:《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失利的原因》,《武汉会战研究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130—133页。敖文蔚:《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》,《湖北抗战》,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,第585页。周启先:《武汉会战中的广济田家镇战役》,《黄冈师专学报》1995年第1期。持此种观点的论著特别多,这里不一一列举,仅择其要者。

^② 程少明:《试析武汉会战中大别山南麓战场的战略地位》,《黄冈师专学报》1998年第5期。原文是“阵地战与游击战、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”,“游击战”一词使用不当。

^③ 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第二卷,军事科学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,第283—284页。

“太湖、宿松、黄梅据点，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，为攻势之支撑即可，应以主力机动使用，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。”^①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制订的中国军队的作战方针是：“本兵团以决战防御击灭当面敌人的目的。拟于黄泥湖北岸亘大金铺、双城驿、亭前驿、二郎河镇、西北连山地占领数线阵地带，拒止敌之西进，依机动转取攻势，将敌压迫于长江方面捕捉而歼灭之。”^②

武汉会战应不应该适当采用阵地战的作战方法，是评价黄广会战中国军队战术运用的前提。笔者认为，在武汉会战中，选择黄广地区作为对日作战的主阵地，在理论上是必要的，实际作战过程也表明它是正确的。

必要就在于，中国军队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，而保卫武汉就必须防止日军沿长江西进，中国海军实力远远不能承担这一重任，只有依赖陆军对田家镇要塞的护卫，通过要塞控制长江航道。如果中国军队采用运动战为主的形式，则日本海军更易长驱直入，日本陆军更易发挥其机动性强的特点。中日军队总体实力的对比，决定了中国军队是防御的一方，日本军队是进攻的一方。很明显，田家镇要塞是武汉的门户，保卫田家镇，是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阵地战的战术的。

正确就在于，黄广地区的地形，北为崇山峻岭，南为水田湖沼，日军的大兵团行动，新武器、重型武器的使用，都受到很大限制，只有宿松—黄梅—广济间公路可以通行，湖山之间，自东向西渐次狭窄，形成牛角，有利于我军逐次抵抗、节节阻击战略的实施。黄广

^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等密电稿(1938年7月26日)，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688页。

^② 《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(1938年2月)》，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会战前后持续达 2 个月之久, 与黄广地区这一基本地形特点, 有紧密的联系。

周恩来于 1938 年 7 月 7 日, 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的《论保卫武汉与中国抗战的发展前途》一文中, 就指出, 在“保卫武汉战役中, 运动战、阵地战应成为密切配合, 游击战要准备发动”, “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, 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, 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, 这样才能达到直接保卫武汉的目的”。因此, 要“在敌人进攻正面的近后方, 以运动战配合(实施防御——笔者加)被进攻的部队, 夹击敌人; 在敌人的远后方, 以广大的游击战……将敌人后方变为前线”。^① 这就充分说明, 在武汉会战中, 运动战、阵地战、游击战, 各有其地位和作用, 三者缺一不可, 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各有侧重而已。那种简单地否定阵地防御的说法, 是错误的。

二

作战方针的正确, 说明中国军队基本战术的正确。问题是关键,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, 中国军队如何运用这一战术? 战术运用正确与否, 对战争的实际进程, 必然发生重大影响。

笔者的研究表明, 实施“阵地战与游击战、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相配合”的基本战术, 影响其战术运用的实际效果, 有两个关键点。一是“侧面截击”或称反击作战的作战时机、作战地点和作战力度的选择。一是各作战部队的协同。

在第一个关键点上, 即在“侧面截击”的作战时机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上, 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有正确的一面, 也有重大失误的

^① 《周恩来军事文选》第二卷,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, 第 135 页。

一面。其中,正确的选择居于多数^①,重大的失误主要有两次。

一次是8月下旬中国军队对黄梅地区的反击。这次反击作战的失误,主要表现在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作战力度的选择不当。

在会战初期,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,对中国军队非常有利,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侧击,效果因而也比较明显。对于这一点,战后日本方面所写的战史和当时参加战场指挥的日军军官,都是承认的。日军一向藐视中国军队,在其参谋机构对“敌情”的分析中,虽然仍称中国军队这次作战的“攻击能力不大”,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军队对日军“进行反复攻势”,日军第六师团的战术必须因此有所调整。^②一位参加战斗的日军部队长也无可奈何地说:“我攻击部队是在严密防范敌人侧面攻击,以免头尾脱节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向前的。18日夜,连辎重部队也持枪整队戒备,严防敌人从我侧面及背后偷袭。”^③

但是,当日军放弃太湖、潜山、宿松,变换后方连络线(补给线)为江湖(黄梅小池口)方面后,中国军队在黄广公路北侧配置强大兵力的价值,就变得较小了,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消极作用。

这时,黄广地区的日军,只有其第六师团的大部共约5个步兵联队,炮50多门,战车约50辆,不到2万人,且已遭到第三十一军在太湖地区的多次有力阻击,疲乏不堪。而我军在这一地区有近7个军,共8万人。^④在人数上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,在装备上跟日军相比,也不相上下,不存在很多论著所夸大的差距。例如,第八十六军第一〇三师就装备了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、轻重机枪,

^①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,这里不一一列举。

^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: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》,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,第2卷第1分册,第142页。

^③ 武穴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:《武穴文史资料》第2期,第94页。

^④ 文闻编:《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,第183页。

特别是“重机枪性能较好,能平高射两用,使用钢心弹时,可射穿轻型坦克的装甲”。^① 其他部队的装备虽有优有劣,总体装备水平与第一〇三师接近。除此之外,兵团还有直辖炮兵3个团(有炮100多门,不包括各军所属炮兵),战车炮若干连^②,我军兵力,包括火力,大大优于日军。日军有孤军深入之弊。毫无疑问,我军应该以主力攻掠黄梅,切断其新的后勤补给线,将战线适时延伸至黄广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,与宿松、太湖地区我军的作战连成一气,主动出击,歼敌一部。这时是我军积极进攻的最好时机。

第五战区右翼兵团适时发起了反击,但没有达到这次反击作战所应该达到的力度。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,在于中国军队对于阵地战和游击战、正面阻击与侧面截击的侧重不同。在战术运用的过程中,作战重点是主要放在阵地战、正面阻击上,还是放在游击战和侧面截击上,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侧重,但在黄广会战中,从总体上讲,中国军队过于注重前者而轻视了后者。

早在战前右翼兵团制订的作战“指导要领”中,就规定,“我应以有力一部转取攻势”,而“主力应确保原阵地”,实际上是把阵地防御始终摆在主要地位,把反击作战摆在辅助地位。在敌军发起强大攻势、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情况下,这样作无可厚非,但在“敌滞留黄梅附近,尚无积极行动时”^③,这样作,就显得过于消极保守了。

这次反击作战的作战区域和攻击目标的选择,也是不正确的。

^① 《武汉会战——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,第179—180页

^②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^③ 《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右翼兵团之作战计划(1938年2月)》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主要表现在,右翼兵团指示的攻击方向多不正确,反攻的结果与中国军队的期望相反,中国军队主力有向北方山地退守的倾向。正确的选择应该是,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日军占领区后方,主攻黄梅南部地区的小池口一带,切断或至少扰乱日军新的后勤供应。

从理论上讲,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,和攻击方向、攻击目标的选择,是有联系的。一般情况下,作战力度越大,攻击目标就越重要;攻击目标越重要,所需要的攻击力度就越大。对照这一理论,我们很容易看出,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实际作战安排,存在致命缺陷。

8月28日,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派第一七六师2个团附野炮兵1个营的兵力,由西北向黄广公路以南及黄梅的江北地区攻击,派第六十八军以1个旅附山炮2门的兵力向黄梅县城东南攻击。^①这两支部队的攻击方向基本正确,但由于兵力不够,加之担任攻击的部队作战意志不够坚决,不能实际完成攻掠“黄梅的江北地区”的任务,所以,攻击没有产生大的效果,两支部队很快就后撤了。

同日,第五战区右翼兵团还派第二十九集团军之一部,即第一六一师主力,同时发起进攻,并获得一定战果。但这支部队的攻击,拘泥于恢复中国军队的原有阵地,大多没有深入黄广公路以南的地区,只能算是阵地争夺战,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。

与此同时,在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指挥下,中国第七军攻克太湖,第十军收复潜山。相比之下,这两个军的实际作战价值就更小了。中国军队收复太湖、潜山,主要的不是中国军队作战努力的结

^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(1938年8月27日)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07页。

果,实际是日军的主动撤退(虽然是在中国军队的压迫之下)^①,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称之为“湖广大捷”^②,陶醉于所谓的“胜利”之中,白白浪费了当时战场上两个最有战斗力的军,确实可惜。

由于反击作战的作战力度和攻击方向、攻击目标的选择的不正确,中国在黄广地区的近8万大军,实际是坐等敌人来攻,耽误了约一周的作战有利时间。中国军队后来的被动,与此极有关系。

必须指出的是,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对黄广地区的实际作战指挥,与蒋介石的构想也是有很大出入的。蒋介石在9月2日给白崇禧的密电中指出,除刘汝明(第六十八军)、王缵绪(第二十九集团军)、覃连芳(第八十四军)部外,“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、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”,“对宿松以东,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”。^③相比之下,蒋介石的构想更合理一些。当然,蒋介石的构想到此时已失去了实施的最有利时机,是“马后炮”,因为日军此时在黄广地区的集结已经完成,并开始反攻。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,使战机稍纵即逝。

三

中国军队黄广会战反击作战的第二次重大失误,发生在9月上、中旬。这次的失误,既有选择反击作战力度不够的问题,也有选择反击作战时机不当的问题。

9月上旬,日军一部突入中国军队在广济地区的笔架山、田家

^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: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》,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,第2卷第1分册,第156页。

^② 《武汉会战——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,第222—227页。

^③ 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17页。

寨、后湖寨、五峰寨阵地，并有迂回田家镇要塞的企图。面对日军新一轮的攻势，李品仙不仅没有选择反击作战的方式，以攻为守，反而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。他重新调整了我军的战线，以一部集结于黄泥湖以北至栗木桥一线，主力则集结于界岭以东高地，准备在他以为最有利的时机再采取攻势作战的方法。

李品仙的这一部署，将广济（指当时的广济县城，即今武穴市梅川镇）—武穴公路暴露在日军面前，使日军轻取武穴。武穴一失，日军攻占田家镇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。其实，日军突入笔架山、田家寨、后湖寨、五峰寨阵地，只是对我军战线之一角的突破，突入的日军数量并不多，被日军占领的阵地标高也只有百米左右，我军退守之阵地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，大佛寨及其以南阵地也无变化，仍在我军手中，第五战区增援部队（第五十五军）的到达，则只需半天时间。此时，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应该命令部队采取反击作战的方式，夺回已失阵地，并不惜代价坚守，等待增援部队并准备实施反攻，而不能以一处一时之失，影响全局之部署。

仅从当时我军的作战兵力来看，这时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作战的时机似乎不成熟。由于连续作战，我军伤亡的确很大。到9月中旬，第五十五军能作战的部队只有不足2000人（原有12000余人，病员7000，此次作战伤亡3000余人），第六十八军有2000余人（西北军不习惯江南湖沼地区作战，病员也较多），第二十六军4000余人（到9月20日只有2000多人^①），第八十四军实际只有4个团，第八十九军有2700人，第一七六师约2个团。^② 第三十一

^① 肖之楚致蒋介石密电（1938年9月21日），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737页。

^②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（1938年9月12日），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军实际不到 1 个师, 约 4000 余人^①, 此时, 整个右翼兵团的作战主力实际只有第七、第四十八军各 2 个师。以上合计, 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总兵力约有 4 万多人。

但是, 日军的困难更大。此时, 日军“死伤甚众, 已无力继续进攻, 因而构筑工事, 转为守势, ……等待补充”。^② 在此前后, 日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, 最少时只有 3000 余人, 最多时也不到 1 万人^③, 不及我军的四分之一。中苏空军则连续出击, 不断地袭击日军前沿机场和登陆部队, 在七、八月的作战中, 共计炸沉大小敌舰 40 余艘, 炸伤 23 艘^④, 给日军以长江为唯一通道的后勤供应, 和在沿江地区的登陆, 带来较大的困难。

由于李品仙不仅没有利用日军的这一困境, 适时命令部队夺回已失的阵地, 反而于 9 月 6 日晚 8 时下令兵团主力转移至“广济西北双方高地”, 只留下第二十六军“协助田(家)镇第二军之作战”^⑤, 实际是放弃广济和田家镇。这样, 当然就不能实现战前右翼兵团确定的“以主力于广济东南地区协力田家镇守备区第二军之作战团, 守黄泥湖、广武湖北岸山地”的计划, 使右翼兵团的主力离预定的作战地域越来越远了。右翼兵团的主作战地域, 原定在广济“东南”地区, 现在在广济“西北”地区。李品仙的一纸命令, 使

^① 《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》,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。

^② 郭汝瑰、黄平章主编: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》下册,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2 版, 第 827 页。

^③ 《广济县志》,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4 年版, 第 281—282 页。

^④ 陈应明、廖新华:《浴血长空——中国空军抗日战史》,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, 第 85 页。

^⑤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(1938 年 9 月 6 日),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, 第 723 页。

中国军队的作战南辕北辙。

对此,蒋介石极其不满。他接到李品仙呈递的有关撤退命令的报告后,立即致电白崇禧等,指出:

往者本委员长以顾虑我军装备、训练及战略上之关系,未遽下攻击命令,兹者敌愈深入,其后方唯一连络线——长江航路,舰船不断受我要击损害,补给大感困难,我则在国内作战,随地均可补给,且山地作战,敌重兵器失其效用,是装备上敌我已处对等地位。故我军黄、太、宿及岷山大屋之攻击,敌一战即溃,足证其战斗力已日趋脆弱。此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良机,非以攻为守、转守为攻,不能保卫大武汉,无以收抗战成果,希即部署所属并使咸喻斯旨,以旺盛之企图,转移攻势,努力杀敌,争取最后胜利。国家存亡,在此一举,其共勉之。^①

蒋介石的电报,虽然夸大了我军的优势,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。对此,白崇禧也有认同。他认为,我军确实应“改取机动配置,正面仍以一部守御,主力集结敌之侧背,求其弱点,相机攻击,断其后方连络线,以此广大地域,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”。^②在白崇禧的督促下,9月7日,李品仙命令所部于8日开始实施反击。^③

但由于前此李品仙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,且各军在撤退时又形成了混乱的局面^④,影响了我军反击作战的力度(特别是作战意志),加之我军新阵地离原定作战地域越来越远,所以反击作战的

^① 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23—724页。

^②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(1938年9月6日)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24页。

^③ 这次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和实际经过,见郭汝瑰、黄平章主编: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》下册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,第827—828页。

^④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效果很不理想,有隔靴搔痒之弊,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日军对田家镇的威胁。在这种情况下,蒋介石在9月11日明确要求“我各军应乘敌立足未稳、增援未到之先,各以放胆之行动,更尽最大之努力,对孤悬之敌再加猛烈攻击,以求收彻底胜利之成果”。^①后又在18、19日给李宗仁的密电中,要求李宗仁亲自督促所部,确保田家镇北侧的安全,并批评少数部队,“或对敌情侦察不明,或对友军支持不力,迹近观望,予各个击破之好机,无异坐以待毙,影响全局,殊堪痛恨”,表示,“如再有互相推诿、观望不前,致失机宜,定予严惩”。^②在蒋介石一再施加的压力下,李品仙被迫一再发起反击。但此时已回天无力,反击作战的时机和反击作战的力度,都不可能达到战场的实际要求。

就在中国军队一再错失良机的时候,黄广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对我军极其不利的新变化。9月8日至14日,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没有达成实际的效果,在广济地区的日军得到了比较好的休整,且补充了新兵3200人,战斗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。同时,日军还命令海军第十一战队与在广济地区的原有日军联合作战,并增加了数十架飞机和20多艘军舰的支援。稍后,又命令第一一六师团第二十联队进驻广济地区,防守日军在广济的新占领区。这样,日军在广济地区的作战能力,就达到了空前的水平,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。在日军新一轮的强大攻势下,田家镇终于9月29日陷入敌手。

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这次反击作战,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,是

^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密电稿(1938年9月11日)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28页。

^② 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35—736页。

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最持久的一次,仅9月22日至29日的战斗就歼敌近7000人^①,予敌以重大打击,延缓了日军攻占田家镇的时间。中国军队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,却未能完全达成预定的作战效果,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,是令人深思、引以为戒的。

四

中国军队在黄广地区的反击作战中出现重大失误,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。

(一)许多将领对前线情况不明、情报不准,甚至故意夸大敌情,导致判断失误。例如,上面所提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中国军队指挥机构对日军动向不清。李品仙一直以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蕲春,直到9月22日,才发现日军的主攻方向是田家镇^②,但此时的发现,已经太晚。知彼知己,方能百战不殆,自古以来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(二)国民党军各级将领有畏敌情绪,作战意志不坚决,经常萎缩不前,影响了战地指挥官实施断然反击的决心。如9月中旬,李品仙命令第一六一、一六二师向双城驿方向主动出击,但两师互相推诿,行动迟缓,毫无进展,每晚只派小部对敌夜袭,拂晓即撤回原阵地。所以,第一六二师保存得非常好,每连除普通师编制外多配

① 《广济县志》,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,第283页。

② 李品仙致蒋介石密电(1938年9月22日)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738—739页。

备轻机枪 4 挺, 另有川造冲锋枪 2 枝、小迫击炮 2 门。^①

另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, 直到会战结束的当年 10 月, 陈诚仍认为参加整个会战的日军有 60 多万人以上^②, 实则只有 30 多万人。这个极端夸大的数字, 就是国民党军各级将领层层虚报所得出来的。如多云山战斗, 日军只有 4 个步兵中队、1 个重机枪中队、炮数门, 人数不过数百, 中国方面的作战部队在向上级的报告中, 竟称敌有数千之众, 虚报的成份也未免太大了。

夸大敌军兵力, 尽量缩小自己的兵力, 谎报战争中自己的实际损失, 是国民党军将领的普遍作法, 连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李品仙本人似乎也不能例外。例如, 关于第六十八军的实际作战兵力,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报告, 说只有 2000 余人^③, 而第六十八军给军令部的报告, 却说有 6000 多人(报告称第六十八军所属除独立第二十九旅有 3000 余人外, 每旅有 1000 余人, 全军有重机枪 27 挺)^④, 两者相差很多。

五

关于各作战部队的协同问题, 中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差了。它是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的另一重要原因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, 如炮兵和步兵的协同太差, 就使中

①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(1938 年 9 月 15 日),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② 《武汉日报》1938 年 10 月 9 日。

③ 李品仙给军令部的电报(1938 年 9 月 18 日),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, 转引自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上册,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, 第 735 页。

④ 刘汝明给军令部的电报,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国军队的反击作战效果大打折扣，当时，国民党军队里就有人评价炮兵在反击作战中“几乎未发挥大的作用”。^①再如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、副师长刘建常在黄广会战之前都没有实际战场指挥经验，到前线后既不明敌情又不与友军联络，就草率发起攻击，对所配属的炮兵第五团，不给任务，不指示射击目标，结果当然是第一八八师遭受极大损失。^②有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以往论著有很多论述^③，这里就不琐贅了，主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。

首要的原因，是中国参加黄广会战的各军，分属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，有广西军、贵州军、川军、西北军，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考虑，保存自己的实力，是他们在这次作战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。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，战后被撤职查办。再如第八十四军第一八八师团长黄伯铭，因一战就即逃，事后被处死。黄广会战实际是众多国民党“杂牌军”参加的一场会战，希望这支“杂牌军”在会战中有很好的协同，是不可能的。

其次，各部队临阵换将，本是兵家之大忌，更增添了他们之间协同的困难。在这次会战中，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军、师一级的指挥员，绝大多数都是新上任的。据笔者的不完全查实，在参加会战的各军中，新上任的军长有：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（7月7日接任，9月13日又由区寿年接任）、第三十一军军长韦云淞（2月16日接任）、第四十四军代军长彭成孚（军长王缵绪临战不到前线指挥，9月25日，彭成孚又调任第六十七军军长）、第七军军长张淦

①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② 文闻编：《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87—188页。

③ 见敖文蔚：《略论武汉会战黄广战役》，载《湖北抗战》，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584页。

(6月21日接任)、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(6月21日接任)。新任军长超过了半数。战前新任的师长就更多了,如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(6月5日)、第一二一师师长牟庭芳(4月4日)、第一三一师师长林赐熙(6月21日)、第一四九师师长王泽峻(3月19日)、第一七〇师师长黎行恕(5月)、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(6月)、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(9月19日)、第一四三师师长李曾志(6月4日)等,师长几乎全部是新上任的。^① 其他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,如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临战前改归第七军指挥,没有时间较充分地构筑工事,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因病住院,只能由副师长代理。^② 等等。

第三,命令多次变更,各部队调动过于频繁,也是协同性差的重要原因。第二十六军原在平汉路南段整训,调江南第九战区不到一周又调回长江北岸。第五十五军由江南调到江北不到一周又调江南,中途又折回江北。^③ 小池口防御原为第八十四军担任,日军登陆前忽令第六十八军第六九一团接替,当第六九一团行至小池口以东的王家霸时,小池口的重要屏障段窑已经失守,守军也去向不明。交防都不能完成,还谈得上什么协同!

第四,指挥系统设置比较混乱。例如,李延年当时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,名义上可以指挥第八、第五十四军,实际是“各自为政,各行其是”,他所能指挥的只有第二军和田家镇要塞守备部

^① 根据曹剑浪著《国民党军简史》(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)上册第360—396页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。

^② 《陆军第三十一军广济附近战斗详报》,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

^③ 《武汉会战研究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72页。

队。^①再如,田家镇位于江北,它的得失与第五战区右翼兵团的作战有密切的关系,却不归第五战区指挥,而归江南的第九战区指挥。

总之,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术方针是正确的。但这一基本战术方针,在黄广会战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具体运用中,有正确的一面,也存在许多重大失误。这些重大失误,与黄广会战中国军队的最终失利,紧密相连,影响了武汉会战的实际进程,是研究武汉会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。

(作者柯育芳,武汉理工大学教授)

(责任编辑:刘兵)

^① 《武汉会战——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,第169—170页。